

想象异国

陈晓兰 主编

现代中国海外旅行与写作研究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时代出版
APCTIME

陈晓兰 主编

想象异国

XIANGXIANG YIGUO

XIANDAI ZHONGGUO

HAIWAI LUXING YU XIEZUOYANJIU

现代中国海外旅行与写作研究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象异国 / 陈晓兰主编.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212-04580-7

I. ①想… II. ①陈… III. ①比较文学—文集 IV. ①1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9965 号

想象异国——现代中国海外旅行与写作研究

陈晓兰 主编

出 版 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洪 红

装帧设计:汪 耘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4.75 字数:220 千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4580-7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内 容 简 介

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势力以各种形式影响中国的事务乃至普通人的生活,西洋或东洋不仅是官方、政治家思考的问题,也是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想象和谈论的对象。人们从不同的途径接触了他们的想象客体,或者从外国物品、或者通过战争、或者从在华的外国人以及与外国相关的事物,或者通过译介的书籍、短期的考察或长期的实地生活,认识了影响中国社会和生活秩序的异国,产生了有关异国的种种言说。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旅行与写作,为异国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异国形象的确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集的论题涉及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的域外旅行与写作,考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苏联及日本等国家的观察与想象及其旅外作品对于异国形象的塑造。

引言

基托在《希腊人》中指出：与希伯来人一样，希腊人强烈地感觉到有必要在他们自己与所有外族人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习惯于将人类大家庭区分为希腊人（Hellenes）和蛮族（Barbarians）”，但蛮族（Barbarians）一词并不包含原始与野蛮的意义，而是“表示那些不说希腊语而只发出‘巴巴’（bar bar）这种噪音的人，只要你不说希腊语，你就是个 barbarian”。“不说希腊语是一种表示，反映了更深刻的差异，它表示他们既不是以希腊人的方式生活也不是以希腊人的方式思考。似乎他们的整个生活态度是不同的。”在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心中，他们与“蛮族”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蛮族是奴隶，而希腊人是自由人”。^① 即使在希腊，希腊人的自由也不施与奴隶和外邦人。

在中国，“华夏居中，四夷居表”一直就是古代中国世界秩序的结构性表述，中国人与其周边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其他民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文明与野蛮。《礼记》中将民族特性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联：“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并从地理环境、身体服饰、饮食习惯对于“中国”周边的族类予以界定：“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

^① 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1—2页。

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①在古代中国人的意识中，地理环境及其相应的衣食习惯和生产方式是决定民族差异的根本之所在。

将我族与他族加以区分是确立民族身份及其国际地位的重要形式，对于异己者的言说也是自我言说的另一种形式，将复杂的异族程式化的同时也凸现了我族的本质，强化了民族归属感与文化认同。人类对于“非我族类”及其所处的“异域”充满了好奇与幻想，表现出既渴望又恐惧的矛盾情感，在有关异国的表述中，异国也呈现出矛盾对立的面目，它是野蛮、邪恶的黑暗地带，也是乌托邦的所在地，异国是什么，取决于言说者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与排斥。

异国形象的树立与传播受制于国际关系，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于另一个国家人民的认知。除了贸易、战争和官方外交，宗教渗透、文化典籍的译介和实地考察是想象并认识异国的重要途径。在早期以商贸为主导的国际交往中，物品成为接触、认识异国的主要媒介。在早期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想象中，出口到欧洲的丝绸成为重要的媒介，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人”(Seres)，被视为一种与欧洲人完全不同的神秘种族。直到18、19世纪，丝绸在西方人的中国想象中依然发挥着作用，中国被视为充满魔力、性爱自由的奇异国家。在中世纪，中国被想象为一个极度富有、奢华的国家，华丽的宫殿，宝石为门、黄金铺地、紫晶做墙，美女翩翩起舞，术士呼风唤雨，骑士有高超的武艺……一个被妖魔化的荒诞不经的中国形象。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所描绘的中国神话般的财富和巍峨壮观的城市景观激起了后世无数的西方冒险者对于中国的渴望。丰饶富裕、繁荣昌盛、人口众多、由专制君主统治的异教国家长期以来主导着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与言说。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园林和工艺品依然是普通人体验中国的媒介，哲人们则通过传教士所翻译的儒家经典、文学作品、耶稣会士的报告，在遥远的中国找到了他们理想的社会模式。伏尔泰问道：“难道我们不借助中国的编年史，就敢

^① 陈戌国：《礼记校注》，岳麓书社，2004，第97页。

随便谈论中国人吗？”^①正是通过中国的历史著作，他在遥远的中国找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来批判法国的政治制度、宗教和文化，表达他的国家和社会理想。在他看来，中国的“帝国政体实际上是最好的，是世界上唯一完全按父权建立起来的帝国，他们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如果一个行省的长官在离任时不能赢得他百姓的称赞时，就要受惩罚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奖励美德的国家。”^②德国哲学家沃尔夫从中国的哲学经典推断“在幸福的年代里，在整个中国人人潜心于知识”，“中国人没有令人不安的大恶”，“努力提倡培养道德风尚，效法以理智为本的大智大悟的前师，前师们崇尚理性的力量，研究如何将这种力量运用到对真理的探求上”，“中国人所有的行为都以自身和他人的最高完善为最终目的。”^③与沃尔夫、伏尔泰相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中国界定为一个靠恐怖原则统治的专制国家，实行“棍棒统治”，“人民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④他对中国人的性格、礼仪、宗教、风俗、法律基本持否定态度。德国启蒙哲学家赫尔德在其《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反思》中表达了他对中国的认识：“在大事上缺乏创造力，而精于雕虫小技”，精明透顶又愚昧无知，为了获利和忠于职守忙忙碌碌，对于专制君主百依百顺，缺乏男子汉的气概和尊严。“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整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对于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⑤18世纪，欧洲有关中国的知识来源是极其有限的，中国风的物品、传教士的报告、商人的旅行作品以及被翻译的中国经典或者偶然相识的中国人，在不同的哲人心中唤起了完全不同的中国幻像。

19世纪，西方人不再只是通过书本臆想中国。殖民主义的扩张和交

① 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69页。

② 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第65—67页。

③ 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第151—155页。

④ 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第34—39页。

⑤ 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第166—169页。

通的便利在欧洲掀起了跨国旅行的空前热潮。除了为谋求利益而来的军人和商人外,传教士、外交人员、社会学家、人种学家、哲学家、文人及旅行者来到中国,他们不只是居住在半殖民地化的条约商埠,有些甚至深入中国广袤的腹地,切身体验了中国的社会现实,他们迫切地想认识并界说复杂的中国社会,他们貌似丰富但实际上千篇一律的书写成为19世纪西方之中国知识的主要来源。19世纪有关中国的书写,以西方的价值标准对于中国的宗教、政治、法律、风俗、文化、军事、经济、医学以及中国人的特性,予以全方位的表现,贬抑和否定的态度占主导地位。他们所展现的中国基本上由一幅幅阴暗的图画和他们在中国的令人不快的经验而构成,譬如通过一次公开的刑罚、凌迟处死、刑讯逼供、残酷的家法界说中国的法律和中国人的残忍,通过裹脚、弃婴和妇女的地位界定中国风俗的鄙陋,通过一次难忘的旅馆经验甚至风干的腊肉界定中国人的不讲卫生,而目睹了一个病人在外科手术中的默默忍耐和旁观者的微笑打趣后便断言中国人对身体痛楚的冷漠,并进而推断中国人性格的冷酷与残忍。正如约·罗伯茨所说,19世纪的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界说无疑“陷入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中”,^①“增长了一种咄咄逼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②中国,被作为西方人的对照面加以否定,作为一个异教国家,它被看作一个上帝的光芒没有照到的、未开化的国家,“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种族”。^③原始落后、停滞不前、穷困愚昧、政治腐败、道德状况低下、风俗鄙陋、缺乏责任感和同情心等是19世纪西方人言说中国的主导话语。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回答一名记者要求了解中国局势的真相时说:“没有真相,也没有事实。你只能根据在这个国家的经历说话,而不管你的居住时间有多长或你的观察力有多敏锐,充其量只能是一次走马观花似的观察。这是中国的博大精深之处。”^④但是,19世纪西方人对于中国

① 约·罗伯茨:《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等译,中华书局,2006,第12页。

② 约·罗伯茨:《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136页。

③ 约·罗伯茨:《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32页。

④ 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郑文鑫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页。

的书写却成为当时乃至后世西方人了解中国真相的重要来源,尽管这些言论带有书写者自己的想象和感情色彩,体现了 19 世纪西方对于中国的偏见,但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存在,西方人的中国观,却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和对于自我的重新认识。

随着 19 世纪东、西洋人之闯入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外国势力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影响中国的事务甚至普通人的生活,对外国的体验构成了中国人经验与情感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充满了创伤的体验。对于 19 世纪以来的中国人而言,西洋、东洋一类的词总是会激起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它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但却是中国试图效仿的榜样。19 世纪中期以来,西洋或东洋不仅是官方、政治家思考的对象,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想象和谈论的对象。人们从不同的途径接触了他们的想象客体,或者从外国物品,或者通过战争、或者从中国的外国人以及与外国相关的一切事物,或者通过译介的各类书籍,或者通过短期的旅游、考察或长期的实地生活,认识了那些扰乱了既定的社会和生活秩序的异国,激发了中国人对于这些异邦人的幻想和认知欲望,产生了有关异国的种种言说,这些言说包括一些在民间流转的传说、文人虚构的故事、学者的研究著述、以及那些亲历异国者半纪实半虚构的游记、通讯等,这些言说也成为传播异国知识、确立异国形象的重要资源。

如果说,1840 年以前,中国人有关西方的知识主要是通过长期的商贸往来、来华的传教士、基督教教义、外国的器物、格致之学的译介……那么,鸦片战争之后,大规模的战争和局部的军事冲突、为了各种利益来华的商人、驻扎在中国的军队、炮舰、传教士、教堂、学校、医院、居住在条约城市的外国人及其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好莱坞电影、铁路火车、电车轮船,更不必说五花八门的洋货……为中国人被动地接触和想象西洋提供了广阔的途径。而更自觉、更深层次的了解与认识则来自于被称为“西学”(或“新学”)的译介,从 1823 年马礼逊主译的《圣经》在马六甲的出版,1839 年至 1840 年间林则徐汇编《四洲志》,1843 年魏源《海国图志》和 1848 年徐继畲编纂《瀛寰志略》的出版,直到 19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开始大

规模译介西学著作,至1899年时,有31类500多种译作出版^①,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和军事科学。19世纪末开始了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译介热潮,仅小说一类,到1911年时就有600部译作出版。^②随着西学的传入,拉开了中西文化比较的序幕,中国人研究西方的重心也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而后转向精神文化的层面。如同西方的“东方学”塑造了东方的形象,“表述或代表了”那个实际存在的实体,并使人们有可能通过这种形象“把握或看到这一实体,”^③中国的“西方学”同样在中国的西方想象和认知中起过巨大的作用。

如果说,欧洲的跨文化旅行及写作,在其异国知识的传播和形象的确立及本土的殖民扩张中起了重要作用;那么,中国近代以来大规模的海外考察活动及旅行写作,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二者都为自己国家的人民和领导者提供了本土以外的世界的知识,成为本土人民认识异国实体的重要媒介。与在知识界流通的思想著作相比,域外旅行作品因其内容的奇特(异域风情)、语言的通俗、叙述方式的随意、以及描写的抒情性、内容的寻美追奇等特点,在民间的传播更广泛、时间更长久,往往作用于人的感性,其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旅外作品也最典型地体现了不同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想象性的相互看法和相互阐释,对国际关系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如法国学者基亚所说,可以从旅行游记中看到“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那些主要的民族神话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么生存的”,“一个民族的声望是如何树立又是如何被摧毁的”。^④中国近代以来大量的旅外游记是中国人有关异国知识和话语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些游记以其独特的地理、历史文献价值及其描绘国家形象的话语方式,反映了100多年来亲历异国的中国人在异文化中体验、认识、书写“现代的”他异者的历程,同时也以另一种形式体现了中国人有关自身和异己的知识体系的变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

① 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89页。

② 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3页。

③ 萨义德:《东方学》,张辉、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84页。

④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165页。

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中国人的异国想象与自我认知,将为我们认识中国人的“现代”观念、对于他异文化的排斥与认同以及理想国家的观念提供另一种维度。而异国,也不仅是一个文化、地域意义上的他者,更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同盟者和对手,每一个人在面对一个异国时,个人的体验必然与民族国家意识纠缠在一起,这使异国呈现出复杂、多重和分裂的特点。

综观中国近代以及民国时期的旅外游记,可以看到,中国游记者对他们所考察的异国的描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地理地貌,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地形外貌、气候特征及自然风光。其次是城市景观,在游记中,城市,尤其是大都会被看作国家形象的主要体现者,因此,也是游记者主要的凝视、体验对象和描绘对象,包括建筑、公共空间、大街及其行人的服饰、表情;体现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名胜古迹;现代化的象征实体、社会政治制度的表征(诸如海关、监狱、议会、医院、学校,等等)。再次是反映一个国家文明特质的伦理道德、风土人情、从行为举止中所见的国民素质,反映人民生活状况的衣食住行。最后,对具有限定性和随意性的东道主代表的描绘。这些被提炼出来的“局部”“现实”并非社会的全貌,但却不可避免地被推广来代表整个国家和国民。游记者对这些“局部”“现实”的文化评价往往无法摆脱自己有限的经验和某些先入为主的“定型观念”。毋庸置疑,这些游记向中国人描绘了异国的社会文化现实,但这种现实是经过游记者的眼光这一“过滤器”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的。游记者的政治倾向、社会身份、价值观念、个人性格,在目的国旅居、参观的时间长短、考察访问的途径、消息来源的渠道、行踪线路图、考察对象、旅游景点的选择、作为一个旅居者在异文化中的生活体验——衣食住行的满意度,中国本土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范式,东道主国家自身对外来者的旅行及书写的控制与操纵等,都影响着游记者对目的国的观感和评价以及最终的写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有关异国的观察和表述在宽泛的意义上说都是带有身份的政治性表述。

近代以来,中国旅外游记写作出现过三大高潮,一是晚清出使各国外交大臣的出使记述;二是20世纪前半期知识分子(记者、学者、文学艺术家和留学生)描绘个人旅居生活、记录各国政治、社会、文化考察的游记;

三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出国潮中，在境外旅游逐渐从社会精英趋向民主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出现的旅外游记写作高潮。虽然近代以来游记者的足迹遍布欧美亚非各国，但美、英、日、苏联以及南洋一直是现代知识分子重点考察和书写的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版了各类“世界印象”、“体验世界”、“看世界”、“名家走世界”和“地球村观察”等旅外游记丛书。近 30 年来中国人游历最多、谈论最多的依然是：美、英、日本三个国家，其次是法、德、意、奥、瑞士等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再度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大量旅外游记的出版发行，表明封闭已久、再度打开国门的中国人走向世界、了解异国、界说异国的愿望。尽管这些游记是个人性的，是游记者个人旅行体验、思想感情、审美判断、价值倾向的记录，然而，个人的经历和对异国的态度及对本土自我的评价，却通过出版和传播与公共意识联结了起来，并“有可能在公众的意识中扎根”，获得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和永恒性。”^①这些游记因作者的权威身份——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地位和亲历者的身份，而成为最不受质疑的外国异质文化的主要传播媒介，因而成了当代中国大众瞭望世界的一扇窗口，它们拓宽了当代中国民众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成为本土全球空间观与全球地理意识的重要来源，并使之从中认识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自然、人文景观及其所承载的文化。

纵观近代以来的旅外游记，可以看到，不论是晚清出使大臣、20 世纪前半期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宏大的政治使命要求下以政治家、官员、社会政治观察家的眼光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社会现状、民情风俗，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具有鲜明的去政治化倾向的海外旅行及游记写作，都表现出将异国景观化的倾向。金钱、财富以及器物作为西方社会的主导象征不仅用以表现西方社会的物质繁荣与科技发达，更主要的在于彰显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特性和民族性格。正是通过他们不断重复的言说，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苏联等被程式化。对中国的精英们来说，

^① 王晓伦：《试论游记创作与近代西方全球地理观形成和发展的关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1）。

西方丰富的物质和发达的科技不仅与人的生活质量、人的存在密切相关，也与政治制度、人生自由、法制、教育、学术、公共设施等联系在一起。他们赞赏西方物质主义的同时还赞赏西方的民主制度、总统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优良品德、以及言论的自由、法制的健全、对于教育的重视、西方人的公共精神和个性主义，等等。即使中国的观察家们触及到了某些与其乌托邦幻想相背的现象，他们也以宽容的态度予以同情性的理解与开拓。郭嵩焘赞扬的英国和法国决不是 19 世纪英、法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如狄更斯、吉辛、雨果、福楼拜和左拉所描绘的那个阴郁、幽暗、充满了不义的国家；梁启超、伍廷芳所宣扬的财富、民主、自由的美国正是令同时期的美国作家们忧虑和批判的那个拜金主义、自由放纵、道德堕落的美国；胡愈之、邹韬奋等中国的亲苏者们描绘的那个社会主义乌托邦也不是斯大林治下的那个苏联。与其说中国的观察家们“看到”或言说的是异国的现实，勿宁说是他们的美好理想和愿望。

19 世纪西方繁华喧嚣的大都会、高耸云霄的摩天大楼、烟囱林立的工厂区、霓虹灯的闪烁、车水马龙的盛况、“升降机”的奇妙、星级旅店的奢华、火车与铁路、花园别墅以及自动贩货机、万国博览会……这些西洋景迷惑了 19 世纪的中国人，同样也令 20 世纪 80 年代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视觉震撼和“文化震惊”，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因而不具有异国情调的浪漫意味。相比于物化的乌托邦，政治制度和精神意义上的国家理想的实现却艰难得多。陆建德在对伏尔泰之英国观的评价中指出：“英国一整套盘根错节的制度不是由普世适用的逻辑推演出来的，那制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有机生成，其根须的纤维组织深入英国特有的土壤，照搬无从谈起……也许英国的某些法律和政治制度是可以出口的，印度、肯尼亚和孟加拉这些英联邦国家可以为此作证，但是亚非产的‘英国椰子’尝起来并不香甜，而且英国的迷人之处恰恰不是她与这些国家表面上的相同之处。”^①更何况，一种文明，不仅体现在地理地貌、

^① 陆建德：《伏尔泰的椰子——兼评普世理想（代译序）》，载伊恩·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刘雪岚、萧萍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 18 页。

经济、政治制度、宗教、典籍中，更体现在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中，正如英国作家爱·摩·福斯特在其《印度之行》中所说，文明体现在一个人坐与卧的姿势中。

本文集并非一部阐述“异国想象”之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著作，其中所收录的论文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前 30 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旅外游记，所论及的国家形象主要有英国、法国、美国、苏联；二是有关异国的文学创作，包括郁达夫、周作人有关日本的写作，巴金有关法国的作品以及当代加拿大个别华文作家作品中的异国书写。

在本文集付梓之际，特别要感谢安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李旭先生的热情支持，同时，也要感谢编辑在书稿的编辑工作中付出的辛勤劳动！

陈晓兰

2011 年 8 月 31

目 录

引言.....	陈晓兰 / 1
郭嵩焘笔下的西方	
——基于《郭嵩焘日记》的西方形象研究.....	陈嘉梦 / 1
特殊历史语境下的“镜”与“鉴”	
——王韬与康有为眼中的法国	景春雨 / 30
20 世纪 20—30 年代中国旅苏游记中的苏联形象	陈晓兰 / 52
“财富、民主与自由”的美国	
——以 1900—1930 中国旅美游记为中心的考察.....	徐一川 / 81
郁达夫小说中的日本女人	
——兼论郁达夫的日本观.....	陈晓兰 / 107
“风物”的怀念和演绎	
——论周作人对日本地方文学的寄情书写.....	石圆圆 / 121
巴金笔下的法国	
——巴金法国题材作品研究.....	宣晓凤 / 130

陈河小说中的阿尔巴尼亚与加拿大·····	徐学清 / 155
当代中国旅英游记中的英国形象·····	丁黎晖 / 168
王蒙海外游记中的美国与苏/俄形象 ·····	黄秀清 / 191
当代中国旅外游记中的西方表述·····	陈晓兰 / 210

郭嵩焘笔下的西方

——基于《郭嵩焘日记》的西方形象研究

陈嘉梦*

近代以来,中国的世界观、民族自我意识在与西方的剧烈碰撞、冲突中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费正清把中国的这一转变描述为两出巨型戏剧——“第一出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第二出是从第一出派生出来的,它揭示了中国在一场最巨大的革命中所发生的基本变化。”^②这种转变导致的结果是:改变了传统中国在华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长期冲突与征服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华”“夷”观念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影响了中国对于西方的认识,重塑了西方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而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中国与西方的军事交锋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思想、政治体制、文化及生活方式的输入,对于近代中国有关西方的想象和认识的重要影响。

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臣郭嵩焘,也是近代思想史和中外交流史上最重要而又最充满争议的人物,被称为“孤独的前行者”,“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作为上层士大夫的代表和朝廷使臣亲历西方,他所代表的“不仅是摇摇欲坠的‘天朝帝国’,而且是渊源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不仅超越了‘天朝帝国’朝廷交给他的使命,而且还超越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形

* 上海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2010 届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学位论文修改稿。

②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 6 页。